

允大老师

洪桂美

允大老师姓洪，名允大。他是我初中时的化学老师，个儿不高，面目慈祥，一张圆圆的脸上总是带着春天般的笑容。

这么称呼他，乍一听似乎很不礼貌。可在我们的家乡，对老师都这么称呼，直呼其名，然后紧跟“老师”两字——若是你没这么叫老师，那就让邻人感到奇怪。这么叫惯了，觉得更加亲切，更为敬重，也就改不了口了。

在我的记忆中，允大老师的教学水平简直跟魔术一样神奇，凡是他教过的班级，化学成绩总会直线上升，甚至遥遥领先。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化学课上总能将那些枯燥无味的化学知识讲得生动有趣，教得好学易懂，就像魔术师变魔术般吸引着我们。你瞧，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又长又难记，吓得我们望而却步。允大老师一眼就看穿了我们的心思，将其连成五字一顿的歌谣，让我们每日记两句。不到一个星期，一百多个常用元素居然全都会背了。还有那些令人头疼的化学分子式，不知老师当初是怎么教会我们巧记妙算的。现在想起，初中的化学课，留给我们的只是愉悦和风趣，就连一向畏惧理科的女生也喜欢上了化学。真是奇事。每每考出好成绩，老师从不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只是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勇往直前。

最令人敬佩的是老师的为人。允大老师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同济大学的高才生。本来他完全可以留在上海做大都市中的一名乘龙快婿。然而，为了一个承诺——在他上大学前父母已经为他张罗了一个对象，而且老师当时也答应四年之后要娶她为妻。为了实现诺言，在上大学期间，他坚决挡住了充满诱惑的丘比特之箭，最终选择了回家乡，回到了那个贫穷而又落后的皖南山区，当了一名默默无闻的人民教师，和师母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老师的平易近人也是有目共睹的。凭他的资历和水平，完全可以清高自傲。可在我的印象中，允大老师却是个老好人，一天到晚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有求必应。只要是他能办到的事，别人只要吭一声，他准会尽力相助。三年初中生活，也从未听说过允大老师与谁闹不和的。对待学生更是关怀备至，严中有慈，爱生如子。

有件事情令我没齿难忘。那时我是住校生，初三的学习抓得比较紧。在一个晚自习上，我正在打瞌睡，被允大老师发现了。课后，老师喊我去他办公室，耐心地询问我，晚自习时为什么没精打采的？我说，天太冷，晚上没睡好。老师又问，你盖几条被子？我说就一条。有垫絮吗？有，但比较薄。老师没再说什么，就让我回寝室了。过了一会，门外有敲门声，同学说有老师找我。我匆匆走出，一看，是允大老师！腋下还夹了条被子。

“给你，盖在上面会暖和一点。”老师把被子递给了我。我能要这被子吗？当时老师家里也并不富裕，三个孩子都在读书呢！师母又没工作。僵持了一下，老师把被子硬塞给了我便回去了。如今想起这些，心中涌动的不仅仅是感激，更多的是感受到了爱，那种近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疼爱——没有怜悯，毫无做作。

初三毕业时，我选择了上师范学校，一半原因便是来自允大老师的爱——那种质朴无私的、就像冬日阳光一样的爱。后来，允大老师被借调去了乡镇企业局，据说是政府部门点名让他去的。由于老师工作踏实，办事有方，深受局里领导的喜欢，直到退休也没让他回学校。但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位尽职尽责、爱生如子的好老师。

如今，我也在三尺讲台上耕耘了二十多年，每每灰心之时，便会想起允大老师，于是浑身的力气又焕发出来。

我的老师郭廷源

赵年珍

我的老师郭廷源先生年近古稀。

1987年，我上初三，郭老师年过不惑，教我们语文。乡村中学师资欠缺，偶尔他也会教我们唱歌，虽则音色并不优美，但并不妨碍他的兴致，用他的话来说，年轻人的生活中怎能没有歌声？我们私下嘀咕他唱得难听，他知晓后并不生气，下次教我们时会说：我虽唱得不好听，你们学得不是挺好吗？你们唱得比我好，这就表示我还算一个合格的声乐老师。我们大笑，课堂上增添许多欢乐的气氛。

农村中学，老师们的另一半大多在家侍弄庄稼，郭师母也不例外，因此郭老师没有晚自习的时候就回家，早晨赶过来上早读，有时难免迟到。十五六岁的我们，正处于好像懂事又实在不懂事的年龄，记得某次班队课上，有同学说：“老师，你让我们不要迟到，可你却迟到呢。”郭老师听了哈哈一乐，说：“意见犀利！的确，要你们做到的事，老师首先应该做到！”后来，他果然不再迟到。

初中毕业后，很难有机会回母校，再见到郭老师时，我已从师范大学毕业了，分到镇上教高中，和郭老师的女儿做了同事，从她那儿得知，老师早几年已从乡村中学调到了镇上，于是相约去拜访。

多年不见，郭老师风采依旧。谈笑间我们抱

怨做教师工资太低，郭老师笑着批评：“是你们太会花钱了吧？该节约的还是要节约一点。我想，工资过几年肯定会涨起来的。等我退休时，指不定能涨到1000元呢。”说这话时是1995年，我当时工资256元，课时津贴奖金之类150多元。郭老师的预见果然不错，几年之后，工资逐年递增，很快突破千元。等到他领取退休金时，当然老早不止千元，看来，他当初鼓励我们安心教育事业，对收入的估计还是蛮有预见的。

而今郭老师早已退休，在家养花种草，含饴弄孙，偶尔回故乡时，我会专程去拜访他老人家。有一次，刚进小区，远远就看到他在广场上骑独轮自行车，胳膊向两旁伸开，努力保持着平衡，远远望去如同玩杂技一般，看着有些惊险。与师母聊起，说老人家选择健身方式，要安全第一。师母看着郭老师，笑骂曰：他哪里听得进我的话，真是越老越叫人操心！郭老师则回应：哪里就不安全了？我有把握呢！说着朝我们做鬼脸，满心的欢乐写在脸上。

又到教师节，不时收到往届学生的祝福短信，我也衷心祝愿自己的老师幸福快乐。我想会的。正如郭老师所言：任尔沧桑岁月，怎奈何我童心一颗！

相信与不相信

向勇

今年是我当中学教师第十五个年头了。

十五年之前我深信不疑的一些东西，现在慢慢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曾经相信“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后来知道，那只是个别教育家的豪言壮语而已。单凭一个教师的力量，并不能改变多少教学现状，教育的成功需要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

曾经相信过分数，认为那和学生的未来息息相关。后来知道，分数不是最重要的，快乐、好奇心、个性发展对于学生的成长才是更重要的。

曾经喜欢教重点班，后来知道，其实普通班的学生也很可爱，毕业后在小巷师生遇到了，还会甜甜叫你一声“老师”的，往往就是这些孩子。

曾经以为教师这个职业是个铁饭碗。后来知道，当你停止了学习，陌生于这个时代以后，90后、00后的学生会慢慢地与你产生距离。

曾经立志要成为“蜡烛”或“园丁”，愿意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现在知道，一个好的教师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奉献，他还需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经常锻炼身体。

十五年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到今天还一

直在坚信。

譬如要时时关爱学生，譬如要尊重学生，不能骂人。譬如不能偏心，不能歧视后进生。譬如要认真备好课，要多读书。譬如管理学生应该是严而不苛的。譬如要多和家长沟通联系，但不许收礼。譬如认为学习是需要投入很多时间的，要想成绩好，除了勤奋刻苦，是别无它途的，所以反对学生玩手机、上网、早恋等。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当老师之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十五年后，以前的一些看法也在慢慢地改变。曾经认为那些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孩子未来会比较暗淡，现在我相信只要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也一样会有美好的未来。以前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那些性格正直、勇敢、独立的学生会发展得更好，因为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可能更有力量。曾经认为师生是很难成为朋友的，现在我相信了，只要你坦诚以待，甚至好多年以后，学生们都还是愿意和你聊聊天，说说他们之间的趣事呢。

十五年了，我总是在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变化，但不变的是对教育和学生们的热爱。

水均益看世界

益往直前

83

2014年1月17日下午4点的时候，休息室的门突然打开，我们几个正在聊天的主持人还没反应过来，普京就走了进来。他上身穿一件西服，但里面的衬衫没有打领带，领口也没有系扣，下身是一条蓝色的牛仔裤。之前总统府要求我们每一位主持人的服装，务必穿成“smart casual”（干净整洁的休闲），看来普京果然是“smart casual”了。

普京笑容可掬地同我们每一位握手。见到我时，他似乎想起什么来了，说：“我们见过好几次了吧？”

我说：“这是第五次了，总统先生。”

普京点点头，然后对我们说：“我去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吧。”估计他说的“收拾”，应该是去补补妆吧。因为我看到他脸上带着淡淡的妆。

十分钟后，我们在三楼那间采访的大房间里全体就位。普京走进来径直坐在了扇形采访区中心的座位上。“圆桌对话”开始了。按照事先的约定，各位主持人

有条不紊，规规矩矩地按顺序开始向普京发问。美国那家奥运专题网站的老记者，问了俄罗斯为索契投入500亿美元的问题，普京认认真真地替他算了账，告诉他没有那么多，而且很多钱是为了索契未来发展，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

轮到我提问时，我先告诉普京，为了这次采访，我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征集网民的问题，网民们的参与热度很高。四个小时之内，有两百多万网民点击了我们征集问题的专题。

普京听到后显得非常高兴。他正了正身子，目光有意识地看向摄像机镜头，说道：“首先，我想通过社交网络、通过其他的大众信息渠道，向所有的中国朋友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知道我在中国有许多朋友，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我们和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我对中国也有着特殊的感情。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拥有同样伟大的文化和非常有趣、勤劳、才华横溢的人民。请替我向他们带去我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这是一种相互的感情。”

听到他这样说，我好像都能感受到其他几位记者正在向我投来“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在这样一个国际媒体联合采访的场合，普京总统公开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如此“赤裸裸”地高度评价，一口一个“特殊关

系”和“特殊感情”，作为在场的唯一一位中国记者，我顿时觉得脸上老有光了。

然而，我没料到，普京那天对我、对中国的这种特殊待遇才仅仅是个开始。当采访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总统府新闻局现场的负责人叫停了采访。只见一队服务员手举托盘鱼贯而入。原来，到了上茶的时候了。

大概新闻局的人看到普京说得有点唇干舌燥，觉得该给总统上杯水了，但也不能冷落了我们这些记者，于是安排了一队服务员进来，给每个人端上了一杯热茶。

现场除了服务员放茶杯的声音，大家谁也不敢出声。这时候，普京突然指着我身边的茶杯对我说：“怎么样？换成你们中国的茅台是不是更好？”

我的耳机里同声传译稍微慢了半拍，估计翻译没料到普京会在这个时候开玩笑。我听到译文后稍稍愣了一下，因为确实也没想到普京会单独对着我开出这个玩笑。不过，瞬间我意识到这是个出花絮的绝好机会，于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敢情好啊。我听说您上次还和我们的习主席在一起喝了点酒，是红酒吧？”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